

“一带一路”背景下马来西亚的语言生态及语言政策研究

俞 杰, 陈美华

(东南大学外国语学院, 江苏 南京 211189)

摘 要:从民族概况和语言概况两个层面分析马来西亚的语言生态,并从地位规划、本体规划、习得规划三方面探讨马来西亚的语言政策。研究发现,马来西亚的语言生态趋于多样化,语言政策时代特色鲜明,推崇马来国语地位,并因经济因素逐步重视英语、华语。为推进“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中马合作,应重视领域外语规划,提升语言产业服务能力;把握“一带一路”汉语国际传播的新机遇,支持马来西亚华语教学,促进中马合作语言互通、民心相通。

关键词:“一带一路”倡议;语言生态;语言政策;马来西亚

中图分类号: H0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131X(2022)01-0057-07

马来西亚位于东南亚,是我国的近邻和重要合作伙伴。自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以来,马来西亚在多层面积积极响应,充分体现了中马两国合作共赢、互利互信的友好双边关系。在商贸合作方面,2013年马来西亚与我国签订《中马经贸合作五年规划》,合作领域涵盖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自然资源开发等多个领域。商务部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中马贸易额达1 311.6亿美元,同比增长5.7%^[1]。随着马来西亚东海岸铁路、全自动无人驾驶轻轨等建设项目的先后实施,“一带一路”倡议为马来西亚经济发展带来多重红利。在文化教育方面,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马来西亚留华学生人数稳步上升。此外,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东马来西亚孔子学院、中马铁路工程双学位合作办学等一系列教育项目的落地,进一步促进了两国文化交流、国际化专业人才培养。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契合马来西亚发展需求,符合我国新时代外交政策,也为两国的战略合作搭建了重要平台。

语言互通是促进两国深度合作、实现民心相通的根本保障,更是服务互联互通建设的重要支撑^[2]。作为典型的多语言、多民族、多元文化国家,马来西亚政府高度重视国家语言政策与规划。鉴

于“一带一路”背景下中马合作的日益繁荣,以语言文字研究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乃是题中应有之义。而对马来西亚语言国情的分析研究,必定能够为推进“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中马合作提供语言助力。

目前国内对马来西亚语言状况和语言政策的研究还相对较少。张宏武从语言生态学的视角分析了马来西亚多语生态环境形成的原因^[3];钱伟针对马来西亚的语言教育政策,阐述了其四个政策演变阶段及影响因素^[4];李洁麟、王晓梅从语言规划的视角,介绍了马来西亚自独立以来语言政策规划的历程及由此产生的语言问题^[5-6];贾文娟、王烈琴等通过分析马来西亚的多语现象,探讨了国家利益、语言意识形态对语言政策制定和实施的影响^[7-8];郭熙、王睿欣阐述了马来西亚华语与方言地位的变化以及海外华文教育发展的趋势^[9-10]。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马来西亚的语言教育政策领域,尽管部分研究对马来西亚的多语环境进行了分析,但大多关注语言地位层面,对语言本体规划的探讨涉及较少。总体而言,全面梳理马来西亚国内语言生态及语言政策的研究相对缺乏,基于“一带一路”倡议有针对性地思考如何通过语言规划助力中马合作的研究更不多见。因此,本文以语言生态、语言政策理论为基础,结合民族、人口、地理状况和主要语言概况等因素,尝试研究马来西亚的语

收稿日期:2022-01-14

基金项目: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语言生物信息安全体系建构研究”(20YYA002)

作者简介:俞杰(1998-),男,江苏盐城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二语习得、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

言生态,并从地位规划、本体规划、习得规划三个方面详细梳理马来西亚的语言政策与规划实践,有针对性研究“一带一路”背景下其语言国情对中马合作的启示,以期为“一带一路”倡议的稳步推进提供语言助力。

一、语言生态及语言政策的理论基础

语言生态(language ecology)是指“特定语言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11]。美国语言学家艾纳·豪根认为,语言与其生态环境的关系可类比为自然系统中动植物与周围环境之间构成的相互竞争、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的关系。豪根进一步将语言的生态环境具体细化为社会、自然、心理三个层面。其中,社会层面是指语言作为沟通媒介,它的演变发展与实际使用会受到历史、政治、经济、民族等因素的影响;自然层面指语言使用者所处的外部自然环境特征,如地理、气候、动植物分布等;心理层面则不仅包含使用者在言语交际过程中的语言选择,还涵盖双语或多语者对自己所掌握的某一语言或方言的使用意愿和态度。语言的生存发展状况是由其所处的社会和语言使用者决定的,豪根提出语言生态的目的之一就是希望语言学家能够更多地关注语言及其使用者在双方互动环境中的关系^[12]。

语言政策与规划(language policy and planning)指政府或学术权威部门为实现特定需要,对社会语言生活和语言本身进行的干预、调整和管理,主要包含地位规划、本体规划和习得规划三个部分^[13-14]。语言政策及语言生态二者联系紧密、相互影响。合理的语言政策应当符合语言生态实际,考虑语言生态的基本格局,而语言生态的演变发展也必然会受到政策因素的影响和制约^[15]。科学合理的语言政策和规划对构建良好的语言生态、推动语言生活的和谐发展能够起到积极作用。总而言之,语言生态与语言政策的结合使得语言政策和规划研究从语言本体转向语言使用的复杂环境,并将语言生态中社会、自然、心理等多元环境因素融入对语言政策的评价和考量。因此,本文从语言生态及语言政策两个层面,着眼于政策制定实施过程中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等因素,尝试描述和分析马来西亚的语言国情,进而更好地理解政策演变过程中所呈现出的特点及背后的动因。

二、马来西亚的语言生态

马来西亚是较为典型的多民族、多元文化国家,这些特点在其多样化的语言生态中有着极为显著的体现。鉴于语言生态研究中“心理环境”分析的复杂性^[16],本文主要着眼于政策制定实施过程中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具体结合民族、人口、地理状况和主要语言概况等因素来分析马来西亚的语言生态。

(一)民族概况

根据2021年8月的统计数据,马来西亚共有人口3 270万,按照人口占比来划分,主要有马来族、华人、印度裔和其他少数民族,分布在马来半岛及加里曼丹岛北部平原、沿海及热带雨林等地区^[17]。其中,马来族占比约69.1%,主要居住在产稻平原地区及沿海地带^[18]。作为马来西亚人口占比最大的民族,马来族在政治等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并在就业和房产购置上保有一定特权^[9]。马来族一般与马来半岛上的土著人统称为原住民,以区别于华人、印度裔等其他族群。华人在马来西亚占比较高,占总人口的23%,约750万人。早在7世纪,随着海上贸易的发展,就有中国商人抵达马来西亚,而大批华人的移入则是在18世纪后期,主要以劳工的身份从广东、福建等中国东南沿海省份移居而来。相较于马来族在政治上的主导地位,华人更多在经济方面起到重要作用。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稳步推进,分布广泛的华人群体使马来西亚更是有望成为东南亚华语教学的研发中心^[10]。印度裔占比约6.9%,从人口比例上看在马来西亚位居第三,大多是印度南部的泰米尔人、锡克人、旁遮普人移民而来。尽管印度裔移居马来西亚的时间要早于华人,但由于多经商或从事手工业,经济实力相对薄弱,因而对马来西亚的政治影响较小^[18]。除了马来族、华人和印度裔外,马来半岛上还有一些土著原住民奥朗·阿斯利人及欧裔、柬埔寨裔、越南裔等移民,这部分人口总数相对较少,仅占总人口的0.1%,主要分布在马六甲、沙捞越等地区。

(二)主要语言概况

马来西亚语言资源丰富,日常交流用语约有134种,主要语言有国语(标准马来语)、英语、华语、泰米尔语、阿拉伯语、马来语方言、华语方言及

其他少数民族语言^[6]。按照语言阶层分布,即不同语言所适用社会场景的广泛性及其重要性,这些语言可划分为高阶语言、中阶语言、低阶语言三种类型,而不同语言在马来西亚的功能和使用场景也都存在差异(表 1)。

表 1 马来西亚的主要语言

阶层	语言	使用场景
高阶语言	国语(标准马来语)	官方场合、政府部门、工商业、学校教学、社区交流、语言景观
	英语	工商业、旅游业、部分学校教学、社区交流
中阶语言	华语	工商业、华人社区交流、部分学校教学
	泰米尔语	泰米尔人社区交流、部分学校教学
	阿拉伯语	伊斯兰宗教语言
低阶语言	马来语方言和华语方言	当地社区交流
	其他少数民族语言	少数民族社区交流

标准马来语作为每个公民都必须掌握的语言,在马来西亚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自 1957 年马来西亚独立以来,马来语便被确立为国语。20 世纪 70—80 年代,因政治局势变化,马来西亚政府更是强制推行单一语言政策。尽管后期逐渐转向实施开明、灵活的语言政策,但时至今日,无论是政府官方、国民教育,还是宗教和工商业,马来语都在社会生活各个层面中被广泛使用,可以说是其“核心语言资源”^[6]。

英语作为马来西亚原先的官方语言和教育语言,早在殖民时期就在马来西亚广泛使用。由于与马来语在多领域存在竞争关系,加之 20 世纪 70—80 年代马来语地位的提升,英语在官方层面的地位被逐步削弱,教育领域曾一度实施“去英语化”政策^[4]。但随着教育全球化的发展,英语应用能力对于提升国家竞争力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因此马来西亚政府不得不考虑通过行政手段来提升英语地位,这在其一系列语言政策与规划实践中有着明显体现。大部分马来西亚人都通晓马来语和英语,这两种语言在社会多领域的广泛使用也对目前实施的单语制提出了挑战。

在马来西亚,华语和泰米尔语分别是华人社区和泰米尔人社区的通用语言,华语还是一些华文小学、华文独立中学的教学媒介语。相较于马来语与英语在语言选择上的激烈竞争,华语和泰米尔语在教育中处于次竞争地位。尽管马来西亚政府对于少数民族的语言相对包容,但依然缺少制度上的支持。阿拉伯语尽管在商业贸易等场合中较少使用,语言使用者人数也相对较少,但在马来西亚以伊斯兰教为国教的社会环境中,仍享有较高的语言地位和语言声望。此外,一些华语方言,例如福建话、客

家话、广府话、海南话、潮州话、福州话等,也在不同的华人社区内部交流使用。同时,泰卢固语、伊班语、马拉雅拉姆语等少数民族语言在少数民族社区交流中还有所保留。这些语言共同构成了马来西亚丰富的语言资源。

三、马来西亚的语言政策

根据历史政治发展的时间进程,1957 年以来,马来西亚的语言政策和规划可以大致划分为四个历史阶段^[5-6]。根据 Cooper 对语言规划基本类型的划分^[14],同时结合马来西亚不同阶段语言规划的特点,本文从地位规划、本体规划、习得规划三个方面探讨马来西亚的语言政策。

(一)地位规划

在地位规划方面,马来西亚出台了多项法律规定和政策文件(表 2),确立并巩固了马来语的官方语言地位。1957 年,马来西亚正式宣布独立,如何促进社会各阶层、各族群的沟通交流,提升国家身份认同感和凝聚力,成为独立之初马来西亚政府所必须思考并解决的问题。1957 年马来西亚宪法规定,马来语是国家语言。值得一提的是,该法令其他条款同样指出,尽管规定马来语是国语,但在未来十年内英语依旧保留官方语言的地位,且并不干涉并保护其他族群语言在国内的使用。基于宪法对马来语国语地位的确立,《1961 年教育法令》规定马来语为所有政府中学的教学媒介语。随着该项法令的实施,许多英文学校、华文学校、泰米尔语学校被强制要求改变教学媒介语^[7]。1967 年,马来西亚国会通过《国家语言法》,废止英语的官方语言地位。除通过行政和经济手段不断巩固马来语的

地位外,马来西亚政府同时还对马来语的使用场景作出具体规定:语言景观中必须使用马来文,并限制其他语言文字尺寸;在电台广播中,华族人名及地名需要使用马来语读法^[9]。这一系列举措进一步推动了马来语在社会各领域中的广泛使用。

表2 马来西亚语言的地位规划

时间	重要法律规定
1957年	宪法确立马来语的国语地位,同时保留英语作为官方语言,保护其他语言在国内的使用
1961年	出台《1961年教育法令》,确立马来语为全国政府中学教学媒介语
1967年	《国家语言法》颁布,确立马来语的崇高地位,废止英语的官方语言地位

(二) 本体规划

在本体规划方面,马来西亚于1957年设立国家语文署,其主要工作是完善马来语、提高马来语普及率和出版马来语书籍,从而在真正意义上确立马来语的国语地位。1972年,马来西亚国家语文署开展马来语文字规范的修订工作,在引入新字母、调整书写和标点符号后,马来文的拼写体系得到进一步调整完善并最终稳定^[7]。此外,马来西亚国家语文署积极开展马来语中科技术语的标准化,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共确立超过五十万个科技术语新词^[19]。语音规范方面的改革则产生了较大的争议。1988年,马来西亚政府要求在学校教学及相关考试或比赛中使用标准马来语音,标准马来语音与印尼语类似,可以借此扩大马来语在周边国家的影响。但是由于该语音与马来西亚国内日常生活中所用的马来语差别较大,而且缺少权威字典,影响了标准语音的教学效果。为此,2000年马来西亚内阁决定放弃标准语音的使用,但因遭到有关团体的反对而不得不暂缓决定。马来语的本体规划经历波折的主要原因是缺乏理论准备,地位规划的预期与本体规划的现实之间存在差距。从理论上讲,语言本体的标准化、规范化是必要的,确立语言的标准化使用形式能够有效促进语言使用者之间的顺畅交流。但在马来西亚语言规划实际中,标准语音推广的受阻和语言使用的随意性,从某种程度上反而推动了语言的使用,本体规划受到争议并没有影响马来语的地位,较少的严格规范恰恰扩大了使用群体的范围^[9]。

(三) 习得规划

在习得规划方面,自马来语被确定为国语以

来,马来西亚政府一直在教育领域大力推广马来语作为教学媒介语使用。1957年独立后,马来西亚政府规定在小学阶段国内分为“国民学校”(以马来语作为教学媒介语)和“国民型学校”(以英语、华语或泰米尔语作为教学媒介语);而在中学阶段只有使用马来语和英语作为教学媒介语的两类学校,并且采用同样的课程大纲^[4]。1960年,马来西亚政府发布《拉曼达利报告书》,除具体规定各类学校使用的语言外,还提出在各类考试中,将马来语和英语作为通用语言来使用。在《1961年教育法令》中,马来西亚政府进一步取消对非马来语教学中学的教育津贴,并提出在适当条件下应将“国民型小学”改制为使用马来语教学的“国民小学”,以逐步实现教育领域的“去英语化”。1969年后,马来西亚语言教学政策呈现“马来人优先”的特点。马来西亚政府宣布从1972年起,国民型英文学校逐步改为马来语教学,而从1983年起高等教育阶段的教学媒介语也不再使用英语或其他语言,全部改用马来语。

20世纪90年代,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世界格局转向多元化发展,在国际贸易与知识传播中,英语的重要性愈发凸显。此外,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华语学习也逐渐变得热门。在这一时期,马来西亚政府一改原有单一国语制的语言教育政策,逐步采取更为开放包容的语言政策。2002年,时任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宣布“数理英化”政策。该项政策要求马来西亚从中小学到大学的数理科目将逐步改为使用英语教学,以提升学生英语水平,并促进国家科技知识的更新。该项政策在当时的教育界引起巨大反响,但在实际实施后,不但影响了学生的学习效果,更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马来语的国语地位^[5]。2009年该政策终止实施,此后马来西亚的语言教育政策呈现马来语、英语并重的局面。2012年,马来西亚政府发布《2013—2025国家教育发展大蓝图》,开始认可华文学校在马来西亚教育领域的独特作用,华文学校的生存状况、发展空间也得到明显改善。同时鼓励学生掌握其他外语,各地学校也在课程中逐渐提供西班牙语、日语等其他外语课程,外语教育政策日趋多元、合理。近年来,随着马来西亚社会对语言所承载的历史文化价值的逐步重视,一些会馆和民间组织发起方言保护计划,通过信息化技术对马来语方言、华语方言进行采集并建立数据库。同时,在部分学校开

放、鼓励师生在校园讲方言,开设方言课程。这一系列举措丰富了语言生态和语言文化,进一步完善了马来西亚的语言教育政策。

四、马来西亚语言生态及语言政策的特点

(一)语言生态趋于多样化,语言政策时代特色鲜明

马来西亚是典型的多民族、多元文化国家,拥有丰富的语言资源,不同语言在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发挥着独特作用。马来西亚语言政策时代特色鲜明:独立时期,马来语被确立为国语,并在一定时期内保留了英语的官方语言地位;20世纪70年代,在教育领域改变英文学校、华文学校和泰米尔语学校体制,逐渐减少英语和少数民族语言的使用;20世纪90年代,重新重视英语,并逐渐认可少数民族的语言地位。从原先单一语言政策的强制推行,到目前逐渐多样化发展的多语生态,马来西亚的语言生态及语言政策与其国内政治环境、国家发展需求、时代变迁等因素息息相关。

(二)语言政策调适语言生态,少数民族语言发展相对受限

科学合理的语言政策对构建良好的语言生态、推动语言生活的和谐发展能起到积极的作用。从语言的地位规划中可以明显看出马来西亚政府为巩固马来语的国语地位作出的努力。从1957年的宪法、《1961年教育法令》到《国家语言法》,一系列语言政策的推行,有效推进了马来语在社会生活中的使用。此外,在教育领域中,语言的习得规划也使得马来语成为全国大中小学的教学媒介语,逐渐取代英语在国家教育中所扮演的角色。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些语言政策调适在一定历史时期不可避免地压缩了马来西亚国内其他少数民族语言的使用范围及发展空间。例如,在语言教育领域,华文小学和泰米尔语小学曾被迫改变教学媒介语。在中学阶段虽然允许独立高中使用华文或泰米尔语教学,但是不认可独立中学的毕业文凭,学生还需通过同等水平考试才能获得学历认可,这影响了当地华人和印度裔对本民族语言和文化的学习。因此,尽管马来西亚的语言政策趋于多样化,但是在国家层面因语言资源的分配不均,少数民族语言的发展仍相对受限。

(三)经济发展需求影响语言生态,为语言政策推行奠定经济基础

在语言习得规划方面,马来西亚政府曾在教育领域大力推行“去英语化”,实行单语制政策。但是2002年“数理英化”政策的提出与强力推行,充分体现了在全球化趋势及知识经济的时代发展潮流下,马来西亚对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言地位的重新认识与思考。对于马来西亚国民而言,英语在就业、教育等多个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已成为一种新的语言资本。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和中马贸易交流的稳步推进,华语在马来西亚语言生态及语言政策中的重要地位也将会逐步显现。

五、“一带一路”背景下马来西亚语言国情对中马合作的启示

马来西亚是我国东南亚近邻、东盟成员国,也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国家。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高质量发展,马来西亚与我国在经济商贸、基础设施建设、教育文化交流、人员沟通往来等方面的合作日益频繁。“一带一路”倡议的稳步推进离不开语言保障,2021年首届中国—东盟语言文化论坛的举行更是凸显了语言文化融通对于推动彼此认同、促进合作的重要意义。因此,对马来西亚语言生态及语言政策的分析研究将有助于我国针对性地完善国家语言战略规划,为推动“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中马合作提供语言助力。

第一,重视“一带一路”背景下领域外语规划,提升语言产业服务能力,为推动中马合作提供战略性、基础性支撑。在社会活动中,不同行业领域关注的语言问题、对从业者语言水平的要求都有所不同^[20]。马来西亚语言生态的多样性表明在政治外交、工程技术、商业贸易、教育文化等不同社会领域,对语言人才的能力需求维度也会各有差异。因此,“一带一路”背景下推动中马合作应重视领域外语规划。在专门语言人才培养方面,应当广泛调研,按需开设马来语及相关文化类课程,以满足教育、文化及外贸翻译等领域的语言需求。从国家层面的战略合作,到企业层面商贸往来的翻译沟通,再到民间文化艺术交流,通晓马来语且熟悉马来西亚文化习俗的专业语言人才无疑是重要保障。因此“一带一路”背景下,可以在课程开设、师资培养、教材编撰等方面进一步完善马来语等非通用语种

人才的培养^[21],从而适应新时期中马合作对语言人才的现实需求。在专业性较强的工程技术领域,可以探索“专业+非通用语”的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将业务能力的强化与语言水平的提升相结合,精准对接“一带一路”发展。此外,在语言产业服务方面,可以就中马不同合作领域开展语言培训、语言咨询、智能语言产品开发、语言外宣设计等多元化的语言服务工作。通过将语言人才培养与语言产业服务相结合的方式,扫清合作中的语言、文化障碍,为两国合作提供战略性、基础性支撑。

第二,把握“一带一路”汉语国际传播的新机遇,支持马来西亚华语教学,促进中马合作语言互通、民心相通。“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不仅有利于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更为汉语的国际传播提供了宝贵的机遇^[22]。基于对马来西亚语言生态和外语教育政策的分析可以看出,华人占马来西亚总人口的23%,华文学校是马来西亚国民教育体系的一部分,华语与中华文化已经融入当地生活,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同时,马来西亚的华语教学历史悠久并已形成良好的教学传统、完备的教学体系。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推进,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共同作用决定了华语教学在马来西亚的普及与发展是必然趋势^[10]。华语教学将不再局限于华人社区的母语教育,也将扩展到马来西亚国内如马来族等族群的第二、第三语言习得。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社会根基,而民心相通的前提必然是语言互通、文化认同。因此,应当把握汉语国际传播的新机遇,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进一步激发马来西亚其他民族的华语学习热情,同时加强汉语国际教育专业人才的培养,推动孔子学院、海外华语教学中心建设项目落地,扩大汉语、中华文化的影响力。

六、结语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语言的作用愈发凸显。本文对马来西亚的语言生态及语言政策进行了详细分析,研究发现语言生态 and 语言政策二者联系紧密、相互影响。马来西亚的语言生态趋于多样化,马来语作为国语地位崇高,英语作为通用语使用广泛,以华语为代表的少数民族语言资源丰富。在地位规划方面,马来西亚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马来语的地位,同时英语、华语、泰米尔语等语言已

逐渐得到认可和重视;在本体规划方面,马来西亚政府设立国家语文署推进马来语语音、拼写标准化,规范科学技术术语使用;在习得规划方面,马来语是马来西亚国内最为普遍的教学媒介语,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政府逐步重视多语教育。

通过对马来西亚语言生态及语言政策全面细致的了解,可以为促进“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中马合作提供以下启示:应重视领域外语规划,在中马合作的商业贸易、教育文化、工程技术等领域有针对性地培养语言人才,进一步提升语言产业服务能力;同时把握“一带一路”汉语国际传播的新机遇,支持马来西亚华语教学,促进中马合作语言互通、民心相通。

参考文献:

-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亚洲司. 2020年1—12月中国—马来西亚经贸合作简况[EB/OL]. (2021-03-12)[2022-01-10].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tongjiziliao/sjty/yzzggb/202103/20210303042845_shtml
- [2] 沈骑.“一带一路”倡议下国家外语能力建设的战略转型[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5):9-13
- [3] 张宏武. 马来西亚的多语生态环境及其动态平衡性[J]. 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9(1):115-125
- [4] 钱伟. 独立后马来西亚语言教育政策的演变[J]. 东南亚南亚研究, 2016(3):80-84
- [5] 李洁麟. 马来西亚语言政策的变化及其历史原因[J].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5):110-117
- [6] 王晓梅. 多语背景下的马来西亚语言规划历程与思考[J]. 语言战略研究, 2021(2):76-85
- [7] 贾文娟. 国家利益视角下的马来西亚语言政策[J]. 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4):21-25
- [8] 王烈琴, 郭黎波, 李卓阳. 多语现象、语言政策与语言意识形态——以马来西亚和缅甸为例[J].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 2021(3):24-27
- [9] 郭熙. 马来西亚:多语言多文化背景下官方语言的推行与华语的拼争[J].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3):87-94
- [10] 王睿欣.“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马来西亚华语教学发展的新趋势[J]. 海外华文教育, 2017(7):903-909
- [11] Haugen E. The ecology of language[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325
- [12] 黄国文. 生态语言学的兴起与发展[J]. 中国外语, 2016(1):9-12
- [13] 李宇明. 语言功能规划刍议[J]. 语言文字应用, 2008

- (1):2-8
- [14] Cooper L R. Language planning and social change[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30-31
- [15] 冯广艺. 论语言生态与语言国策[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3(3):159-163
- [16] 张治国. 南亚邻国不丹的语言生态及语言政策研究[J]. 语言战略研究, 2016(3):76-82
- [17] 马来西亚国家概况[EB/OL]. [2022-01-10]. https://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yz_676205/1206_676716/1206x0_676718/
- [18] 曹庆锋. 马来西亚民族政策的历史嬗变及其启示[J]. 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4):67-72
- [19] Gill S K. Language policy in Malaysia: reversing direction[J]. Language Policy, 2005(3):241-260
- [20] 李宇明. 领域语言规划试论[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3(3):86-92
- [21] 陈美华. 面向“一带一路”建设的外语规划研究[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20:214
- [22] 王建勤. “一带一路”与汉语传播:历史思考、现实机遇与战略规划[J]. 语言战略研究, 2016(2):33-38
- (责任编辑:刘鑫)

A Study of Language Ecology and Language Policy in Malaysia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YU Jie, CHEN Mei-hua

(Southeast University, Nanjing 211189,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nguage ecology and language polic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language ecology of Malaysia, and discusses the language policy of Malaysia from the facets of status planning, corpus planning and acquisition planning. It is found that Malaysia boasts the diversified development of language resources. With distinctive time features in its language policy, Malaysia respects the status of Malay as the national language and gradually attaches importance to English and Chinese concerning economic factors. In order to promote Sino-Malaysian cooper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he foreign language planning catering to different fields should be vigorously promoted and the service ability of the language industry should be further improved. Also, it is important to grasp the new opportunities of international spread of Chinese language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to support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in Malaysia, so as to boost the language connectivity and people connectivity of Sino-Malaysian cooperation.

Key word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language ecology; language policy; Malaysia